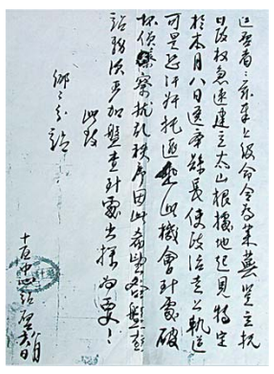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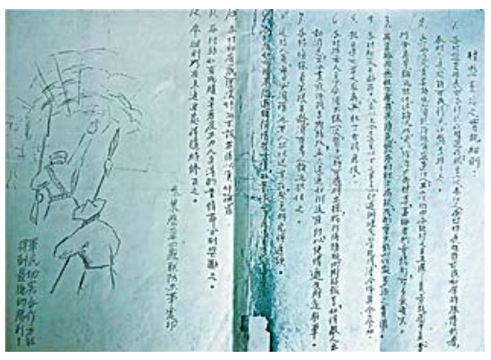
■ 历史影像

1941年8月，有谭克平题字的西抬头抗日烈士纪念碑，位于莱城区雪野镇西抬头村北的小山上。

抗战时期的莱芜农民合作社纸币。



1939年8月6日，十区中心站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严加盘查的命令。



1939年8月1日，泰(安)、莱(芜)、历(城)、章(丘)四县抗战联防办事处关于村盘查站之实施细则。

■ 周末人物 八一战旗飘·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

目前已知的、参加南昌起义的山东籍将士只有5人，淄博人谭克平是其中之一。在他看来，想要“克敌平虏”，必须武装起来，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。为实现民主政治，共同完成“抗战必胜，建国必成”之任务，他鞠躬尽瘁，捐躯报国。

谭克平烈士像。

谭克平：武装起来，是真出路！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盛夏时节，淄河上游，马鞍山下，在葱郁树木掩映下的西石门村，红瓦白墙，宁谧陶然。唯有辛泰线上早晚从村西绕过的绿皮慢火车，从这里过往源泉、南博山、莱芜，用咣当咣当声提醒着农人，时光的指针在分秒必争地拨转。

村子南北横铺，西卧在横插云端的马鞍山下。仿佛命中注定，谭克平从这里出发，怀抱着共产主义信仰，在鲁中山区奔波，如同绿皮小火车的行迹，最后又在故乡的黄土中长眠……

奔武汉，拼生以求死

“1906年，谭克平出生在西石门村一户较殷实的家庭里。这里的山水养育着他。”博山区文史研究专家王济世介绍道。“谭克平自幼聪明伶俐，活泼好动，6岁入学，12岁考到博山中学。在学校里，他勤奋好学，为人豁达。”

1923年，谭克平的视野之窗豁然敞开。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

当时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王祝晨先生热心教育、思想开明，能新旧共蓄、兼容并包。“在这种办学思想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下，一师的革命活动、文艺活动十分活跃。”王祝晨四子王恒曾如是说。

1923年2月，中共山东省立一师第一个地下党支部诞生。支部里的年轻人奔波于校园内外，传播马列主义，发展党团组织。1924年，支部在校内建立“书报介绍社”，新文学、新思想如雨后春笋，革命空气相当活跃，一师成为当时济南学生运动的中心和大本营。

“由于思想进步、表现积极，1925年，谭克平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”王济世说。

谭克平入党不久，北伐战争爆发。短短几个月，北伐军连克武汉、南昌、汉口等大中城市，席卷大半个中国。

曙光来临前的黑暗，最是难熬。1926年夏秋之际，督鲁的军阀张宗昌甚为恐慌，派军队包围一师，要逮捕进步师生。恰在此时，从武汉传来消息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正在武汉大量招生。

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，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，一师和济南各校进步同学一百多人，于1925年冬至1927年春，分批离开济南，秘密南下武汉，投入大革命洪流中。在先后南下的一百多位学生中，90余位是谭克平等省立一师的同学，以及正谊、一中的今公寿、刘辉等。

当时，“狗肉将军”张宗昌既惧怕革命党人混入山东，又怕山东人跑出去参加北伐，故对车站、关卡、海港、码头盘查很严，重点是济南、青岛。动员组织如此数量的学生南下武汉，是相当危险的。

在山东省委的关怀下，经过细致周密的组织安排，每人发给大洋三十元作为路费，并根据同学们的面容性格，分别化装成商人、挑夫、小贩、少爷、小姐和家庭妇女。

这些进步同学先乘胶济路火车到达青岛，然后投奔指定的接头人——《青岛时报》总编辑王子云同志，由他妥善照料，再通过我党打入青岛敌军做副官的谢同志，想方设法护送同学们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。

上海是军阀孙传芳的天下，盘查较山东松些，根据事先安排，进步学生被安顿在霞飞路一家旅社。后经上海党组织的帮助照料，化装成跑单帮的小商人和家庭妇女，闯过一道道关卡，终于胜利到达革命中心——武汉。

“谭克平紧随党的步伐。1927年7月底，他随大部队到达南昌，参加了起义。”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肖燕燕介绍道。

起义后，谭克平随部南下，准备攻打广州。南下途中，部队秋毫无犯，公买公卖，不抓夫，不闯民宅，并提出“打倒蒋介石”“打倒土豪劣绅”“耕者有其田”等口号，宣扬了人民军队的号召，得到人民的拥护。

当大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围截后，谭克平辗转多方，回到山东，继续开展革命活动。此次历练，让他完成了由一介书生到革命军人的转变。

与谭克平一批南下的大部分同学，则在叶剑英的带领下，直奔广州，参加了12月11日深夜的广州起义，绝大部分壮烈牺牲。他们的老校长王祝晨先生闻讯后悲愤至极，大声说：“我当先生是教学生学‘生’，不是教学生学‘死’。但生与死是一回事，拼生以求死，正是拼死以求生。”

回博山，枪杆子抗敌

90年前，那批20岁出头的年青人，在时代裹挟中，于成熟之前，也要交些“学费”。

谭克平曾把守的马鞍山南天门下的天梯，越走越窄，越上越陡。

与谭克平同年入党的淄博老乡闫康侯曾回忆，南昌起义归来后，谭克平作为博山县第七区党的负责人，在1928年“清明”前后，找到自己说：“蒋介石已彻底背叛革命，仇杀共产党，所到之处，与地方势力、封建上层人物勾结，狼狈为奸，成了新军阀。看来，国民党的军队可能很快到山东。如他们来，我们的同志能在当地隐蔽着最好，做些公开合法的工作，如农民协会、文化教育事业等；如不能隐蔽就干脆远离本乡，暂避风险。”

之后，闫康侯协助谭克平组织农民，办公益事业，办农民夜校等。在屡次被国民党架空，诸多农民自治工作难以展开后，闫康侯感觉出来，谭克平“做些公开合法工作”的说法是自欺欺人的幻想，“以后才知道，这是陈独秀的合法主义、投降主义错误路线，在党的基层中尚未彻底肃清。”

在对敌斗争中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1928年5月，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全部控制济南，确保其与本国交通上的安全，要求蒋介石在济南以及胶济铁路20华里以内不得驻兵。昏聩的蒋介石任人摆布，将济南拱手让出。

国难当头，谭克平不停地奔波于济南、淄博之间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。这时，他老家的北套间成秘密联络点，同志们经常在这里聚会，研究如何革命，如何开展抗日救亡运动。

谭克平的活动，很快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，他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。为扑灭这颗革命火种，反动派对谭克平进行搜捕。在屡次脱险后，谭克平的父母坐不住了，他们为自己孩子的前途命运着想，千方百计托亲戚办好去法国的护照，卖房卖地凑钱让谭克平出国。

结果，谭克平口中应承，却把钱带到济南做了革命活动经费。一天夜里，谭克平等几名青年聚会时，被敌人逮捕，关进山东省第一监狱。在狱中，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，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，更没有出卖同志。

一次，监狱长对犯人进行“人性化”训育，来粉饰自由、博爱，谭克平义正词严地驳斥敌人道：“你们的自由、博爱，如同妓女对嫖客说‘我想你’。”敌人哑口无言，仍以“政治嫌疑犯”的罪名，判处谭克平二等有期徒刑9年6个月。

党组织一直没有放弃对同志的营救。在1928年年底，山东省委的《山东济难工作报告》中，有专文指出：“对田厚起、谭庆信（谭克平原名）、李剑池、薛文英、马守愚等要赶快设法营救。田、谭、李已有些眉目，党内急需他们出来工作。”

费尽周折后，1933年7月，谭克平经组织营救出狱。出狱后的谭克平身体极度虚弱。他先是回到老家西石门村，休养了半年多。这是他自从离家去博山、济南读书后，在老家待的最长的日子。

由于文采甚丰，半年后谭克平又回到济南，被聘为《山东日报》湖光副刊主编。当时《山东日报》的总编辑是爱国人士牟宜之，他疾呼抗日救国。谭克平在报社羽翼的保护下，一边做编辑工作，一边从事革命活动。

在报社的经历，让谭克平更清楚地认识到党指挥枪的必要性。他时刻关注红军长征的进展，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，更是铁心追寻。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山东省委响应中央号召，陆续派出党员、干部到各地恢复发展党的组织，建立抗日武装。谭克平受组织派遣，回老家组建抗日游击队。

1938年2月，谭克平与博山工委负责人张敬焘等人取得联系，在莱芜响水湾村建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方面军总队。谭克平任政治部主任。两个月后，该部编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，谭克平调任四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，负责做群众工作和地方工作。

此时，谭克平逐渐成熟，他用脚底板在鲁中的山水间穿梭，戴着黑框眼镜，书生意气渐渐化成战斗经验。随着对民情、敌情的深入了解，加之在报社的锻炼，他能妥善处理繁杂的事务，与敌人相周旋。

主莱芜，意志比钢硬

1939年5月，根据山东分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，在四支队的支持下，泰莱历章四县抗敌联防办事处在莱芜成立。谭克平调任四县抗敌联防办事处主任。

四县抗敌联防办事处相当于政权机构，统领泰安、莱芜、历城、章丘四县的抗战统一事务。谭克平听从党的指示，将莱芜的党组织、抗日群众团体率先蓬勃发展起来，青壮年自愿参军参战的日渐增多，党政部门也大幅增加。

东方亮了，西方却暗了下去。共产党为抗日奔走呼号时，国民党莱芜县长李长依，在敌人扫荡时，不战而逃。在万分散乱，抗战没有领导者，民众无所适从时，泰莱历章联合办事处召开全莱各界代表大会，到会代表170余人，决议恢复抗日政权，民选县长，以便领导民众与鬼子作战。全场一致通过，选举谭克平为县长。

8月20日，谭克平宣誓就职。至此，泰山区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诞生了。1939年9月17日《大众日报》第一版上，对此报道说：“……**选举谭克平为该县县长，以坚持反‘扫荡’，彻底实行抗战建国纲领，该县长自就职以来，工作甚为积极，对于改善民生，发动民众，领导游击战争，多有建树。**”

目睹日寇大举扫荡时，对各乡村的烧杀、奸淫、掳掠，使谭克平和广大民众在血的教训中领悟出大道理：妥协逃亡是自寻死路，惟有自己武装起来，用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和鬼子拼，才是真出路。

要武装，枪炮的支援成了头等大事。莱芜七区朱家庄的小铁匠朱乐山，在党的教育下，认定共产党一定是为穷人谋福利的，早早下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。

1938年，徂徕山起义之后，泰安、莱芜、新泰等县相继成立了县武装，他们的武器损坏后，大都送交朱乐山修理。开始，朱乐山坚持不收费，可部队的同志说什么也得给，最后达成协议：只收工料费和手工费，够吃饭就行。

看到部队打游击，朱乐山甚羡慕，多次找到谭克平，要求参加八路军。可谭克平总是拍着他的肩膀解释说：“你现在在地方为部队修枪，比到部队上更能发挥你的作用。到适当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来请你。”

1939年秋，莱芜、新泰、泰安等县先后成立县大队（独立营），所用的枪支大都是旧式的，损坏较多。为适应新形势需要，谭克平找到朱乐山说：“现在是你出山的时候了，带上你的武器（铁匠工具）和人马（徒弟）出来吧！县政府决定成立修械所，主要任务是为抗日武装力量修理武器。物资供应由县政府负责，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由县委直接领导。”

1940年的一天，谭克平来到修械所对朱乐山说：“现在部队武器很缺乏，不少同志都还背着土枪和鸟枪，有的只背着四个手榴弹。部队急需武器，你会造枪吗？把人员分分工，一部分人搞修械，一部分人造枪吧！”

朱乐山尚未张口，谭克平见他面有难色，便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笑道：“困难肯定是有的，这我们都知道。困难这东西就是爱欺软怕硬。”

“是困难硬还是共产党人的意志硬？”谭克平问道。

朱乐山坚定地说：“请领导放心，为了抗战的胜利，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克服！”

没有机床和模具，手工造枪，谈何容易。一个重2.7斤的步枪机毛坯，做成枪机时还剩1斤；一个重8.5斤的机枪底板毛坯，做成时还剩3.7斤。支支枪支都是用锉刀硬锉去，錾子硬剔去，手拐钻钻去，用手指抠出的。“如果说钢梁磨绣针是用磨石磨成的，我们的兵器则是用血肉和意志磨成的。是人硬还是钢铁硬？我看人的意志要比钢铁硬十倍、百倍……”朱乐山曾感慨道。

修械所制造的枪取名马步枪。因为一次可压五发子弹，也叫土压五。经试打完全合乎要求。当朱乐山背着用手工制造的第一支枪送到县委时，谭克平高兴地把枪从上到下用手抚摸了个遍，连声赞“好”，并希望抓紧造出更多的枪装备部队。

召四县，全民皆为兵

民选的县府成立后，人少活重，工作人员没有薪水，上下的生活全是一样，不论县长、伙夫每月都只发一块钱的鞋袜费。可各人都是兴高采烈工作，昼夜不停，他们没有不满，没有怠惰，只有和民众打成一片地工作着。

谭克平深知全民皆兵的重要性。他发动各区群众，让他们踊跃参战。群众们越发知道，抗战是救国，同时更是救自己，所以每一件抗战工作，参加的人数非常之多，且都是认真去做。

抗战工作，除了打击敌人，更需防备伪军和汉奸。民主政权建立后，谭克平提出建立盘查站，在村、乡、区、县皆设站，组织严密。各盘查站里都有路条和出入证，要想出门，非有村长或保甲长的证明不可。假若行路没有路条，寸步难行。

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，县政府又在各村建立抗日人民自卫团。凡是16岁到50岁的适龄男女，都组织到自卫团中来。他们使用着长矛、鸟枪、大刀、木棍，不分昼夜地在街头、巷尾、路口、道旁站岗放哨，监视敌人活动。一旦发现敌情，即一村传一村地将情报送给部队和机关。各村自卫团成立后，和盘查站配合起来，效力更大，汉奸也更难行动了。

除了军事上的准备，谭克平还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，针对民众需要，根据抗战原则规定各种设施：成立“筹给处”，对给养统筹管理，实行累进税法，务求合理负担；废除苛捐杂税，解除民众痛苦；赈济灾贫及抗战家属。

1939年10月，为了稳定金融，莱芜县筹办纸币印刷所，印刷所设在陈家庄李宪臣的后宅里。印刷机、铅字是谭克平县长从济南通过关系托人买出后，经过伪装运到印刷所的。印好的纸币放在秘密仓库——屋下的地窖里，窖口设在地瓜井内。在与敌人斗智斗勇的各项新政施行后，民众深感县政府得人，莫不称庆，称赞谭克平是“模范县长”。

1941年下半年，形势越来越紧，根据地被敌人蚕食。谭克平所在的县政府根据地中心付家庄，南离大王庄敌伪据点9公里。敌伪据点星罗棋布，挤压着我军的生存空间。

为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，化整为零，县委、县政府大都拉到莱芜县东部和章丘、博山交界处活动。1942年9月18日，日寇纠集了几千兵力，将这一带团团围住。

我军为避敌之锋芒，便收缩到地形复杂、山势险要的吉山一带，与敌展开周旋。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，谭克平因拉痢疾行动困难。他的警卫员小张负伤后，换成15岁的公务员小韩照顾他。别看小韩年纪小，却非常机灵。为摆脱鬼子的追捕，他掩护着县长巧妙地和敌人兜圈子。

当敌人追到距他们百十米的时候，谭克平急中生智，把望远镜一摔两半，向追敌扔过去。鬼子没看清何物，误以为是新式武器，立即卧倒。敌人见未爆炸，方知上当，又继续追赶。小韩也灵机一动，将装满沙土的白铁缸子扔向敌人。乘敌卧倒的瞬间，小韩掩护谭克平绕到一块巨石后面，沿着陡峭的山崖滑下去，摆脱了敌人。

守天梯，“精神终古焕”

祸不单行。1941年，先旱后涝秋来霜，天灾加上人祸，老百姓更没法活了。鬼子、宪兵、汉奸、伪军，把老百姓的血汗吸干。群众连糠菜也吃不上了，有的把屋顶的烂尾草扒下来搓搓，用水和了上锅蒸食。不知有多少人背井离乡，四处逃荒。

此时，谭克平牢记党的指示，响应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的号召。既反“扫荡”，又抽出时间开荒种地，拾粪积肥，种粮种菜。每到农忙季节，还帮助群众抢收抢种。

看到干部战士吸豆叶、地瓜叶，政府决定每人发给半斤黄烟钱买烟抽，但谁也不要。每人每天两分钱的菜金和每月一块钱的鞋袜钱也发不下去。同志们说：“群众这样困难，我们怎能搞特殊呢？艰苦怕什么，把艰苦吃光了，甜就会到来。”

当谭克平投身抗战时，家中却遭受牵连。“谭克平有一个弟弟，是当地很有名气的中医。因是抗日家属，1942年秋被日伪汉奸以看病为由骗去杀害。谭克平闻讯后悲痛万分，回来查找谋害其弟的汉奸报仇。”谭克平的族弟、东石门村村民谭庆多回忆说。

因担心敌人在自己老家西石门村有耳目，谭克平在11月8日夜间到东石门村谭庆多家了解情况。次日凌晨，谭克平披着朝霞爬上村东邻的马鞍山，看望那里坚守着的战友们。在山上守卫的，只有一个班的正式武装，其他都是伤病员和家属。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同志，在茶叶口遭遇战中负伤，锯掉右腿后，仍要求一边疗养，一边守山。

那时，敌人扫荡的大网在迅速收拢，马鞍山成了敌人最想啃掉的硬骨头。谭克平上山后，发现山上武器很少，除王凤麟带的一支阻击枪和匣子枪子弹较多外，只有八支“章丘造”，每枪也只有十几发子弹，另外还有手榴弹40多枚。

鬼子攻山前夜，富有战斗经验的王凤麟调整防守力量，谭克平、李成武等守南天门，并对南天门的胸墙重修加固。调整弹药，山在人在，做好了残酷斗争的准备。

南天门下，是一道天梯。即使在今天徒手上爬，仍需全神贯注。天梯有132级台阶，在悬崖上凿制而成，因陡峭如梯子，最陡处达70度角，最窄处只容一人通过，故得名。

11月9日清晨，敌人猛烈的炮火倾泻到马鞍山东西两峰上，十多架飞机进行轮番轰炸。王凤麟同志嘱咐大家，注意有效地提高有限弹药的杀伤力。

日寇进攻马鞍山打了一天，夜晚在周围山头上宿营并点起一堆堆篝火。“我受父母嘱托，乘夜色避开敌人沿小路爬上马鞍山，谭克平正与王凤麟副团长等人研究战事。得知我是来劝他悄悄下山的，谭克平长叹一声：我知道这次凶多吉少，很可能咱兄弟是最后一次见面了。请告诉叔婶谢谢他们，我现在下山就是临阵脱逃！”谭庆多对那一幕终生难忘。

9日夜里，王凤麟、谭克平等人抢修被破坏的工事，重新组织战斗力量，并敲钟击鼓通知山下同志。

第二天一开始，敌人有了增援，火力更加猛烈。到下午时，山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全部耗尽，石块成了唯一武器。

石块作战，使得战斗的节奏减缓。敌人趁机在南天门丢下两枚炸弹。只见胸墙倒塌了，敌人的火力还严密封锁着这个地方，谭克平和李成武等血肉模糊地倒在炸弹坑旁边的碎石堆里。

战斗结束，我方守山的休养员及家属不到30人，却抗击了2000余名装备精良的日伪军。两天苦战，敌人死了二百余人，消耗了大量弹药，最后只不过取得了一个空山头。数天后，敌人撤离马鞍山，谭庆多与族人摸上山为谭克平收尸。

“山或崩，石或烂，烈士精神终古焕。”原博山县县长毛梓材撰写的《马鞍山抗日烈士赞》碑文，如是评价谭克平等人的壮举。

■ 责任编辑 郭爱凤